

以弱胜强,东北解放战场一次作战歼灭敌整个美械师——

新开岭“瓮中捉鳖”

■罗德海 徐冬良

1946年10月31日,新开岭战役打响。东北民主联军克服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坚持以诱敌深入调动敌人,以集中兵力制胜强敌,成功全歼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军第25师,开创东北解放战场一次作战歼灭敌整个美械师的先例。

集中兵力构建战场优势。新开岭战役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攻我守的不利形势下取得的胜利,堪称我军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的经典战例。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占有很大优势。论兵力,敌人先后出动8个师共10万之众,而我第4纵队只有3个师,且其中1个师在辽宁永陵、新宾地区配合第3纵队作战。论装备,敌人不仅有美械装备,而且有飞机、大炮、装甲车助阵,而我军装备主要是轻武器、山炮和榴弹炮。国民党军第25师也不同于国民党地方派系中的杂牌军,而是地地道道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向来以敢于大胆机动、迂回穿插而著称。在敌人来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我军既没有一味避战退让,也没有与强敌蛮打硬拼,而是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有计划地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转移。主力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由桥头以南至摩天岭、连山关地区,连夜向赛马集以东地区转移。敌军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在追击过程中时常被我军牵着鼻子走,造成敌军兵力愈加分散、我军兵力愈发集中的态势,为我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整个战役全程,我军始终坚持集中兵力的方针,先是利用第11、12师会合时机,歼灭敌赛马集守军2个营,吸引敌主力回援;尔后在原计划的双城子围歼战中,我军通过侦察发现敌25师75团已归建,敌方总兵力已达到8000人,我方2个师外加1个团的万余兵力并不占优势,我4纵队主动放弃原定计划,一面撤往新开岭地区,一面与敌保持接触、继续诱敌深入。骄横自大的敌25师一路追击、孤军深入,追至新开岭时,我军已集中起第4纵第10师、11师、12师8个团的兵力,形成了2:1的局部兵力优势,敌25师在我军围攻下,很快陷入绝境。战后,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在总结新开岭战役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的军事指导原则。国民党军战史在记述



新开岭战役纪念碑

新开岭战役时,也认为此次失败的要害在于共军“集中兵力,予我突进之一部以重大之打击,逞其避实击虚、以大吃小之能事”。

选准战场确保以弱胜强。新开岭战役中,我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歼灭拥有美械装备的强敌,预设战场的地形地貌也有很大关系。新开岭位于宽甸以西约35公里,主要包括暖阳边门、黄家堡子、王家堡子等地,宽(甸)赛(马集)公路和暖河穿越其间。沿宽赛公路和暖河两岸地形相对开阔,但均在四周高山重叠之下,形成一个东西走向十几公里长的袋形谷地。谷地北侧老爷山是这里的制高点,东南暖阳边门的东山可以控制公路通往宽甸的出口,南边404高地是谷地南面屏障,西面的571和586高地可以封锁通向赛马集的公路出口。这是一个隐蔽兵力打大包围围歼战的理想战场,我军只要占领这几个高地,钻进谷地的敌人便瓮中之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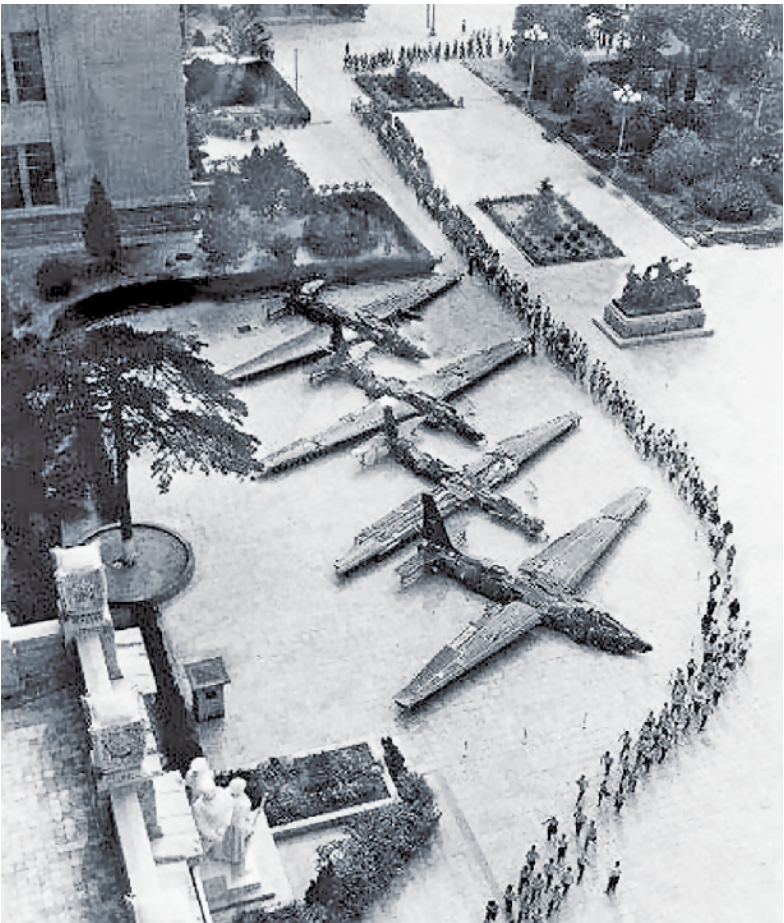
新开岭战役中,牵制敌人的我第11师,采取节节阻击办法边打边退,故意给敌人造成我抵抗无力的错觉。敌25师一路紧紧咬住我军不放,伸着脖子往“口袋”里钻。当敌先头部队进至暖阳边门以西黄家堡子一带,后卫部队也进入我包围圈时,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前面扎紧“口袋嘴”,后面兜住

“口袋底”,敌人顿时陷入重围。新开岭地区的山地环境对敌美械装备形成严重制约,汽车在山间跑不起来,大炮在谷地不易展开,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我军则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发挥兵力火力优势,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分割围歼,战场局势完全逆转。敌25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段培德回忆:“解放军的山地阵地位置分散,而火力能集中,致使25师山地营不易找到目标,还击困难;25师的山地阵地,终究在盆地之内,受到解放军步炮的双层压制,处处被动,只能挨打。”

英勇顽强压垮强敌对手。新开岭战役既是我军战略战术的杰作,也是我军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浴火淬炼。战役进行过程中,我军步行200公里向赛马集以东地区集中,参战官兵昼夜连续行军、作战,战斗精神状态始终饱满,连续作战达15天之久,面对强敌始终敢于战斗,充分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我第4纵队第10师最初调到新宾地区配合第3纵队进行作战,随后又调回参加新开岭围歼战,在强行军、机动频繁、准备仓促情况下迅速投入战斗。第11师在10余天内连打5场大战,顽强阻击敌人,保证纵队主力在预定地区歼敌。第12师在沈安线阻击战斗,某连战斗排的多数官兵牺牲,电话员、卫生员和通信员挺身而出,丢下电话机和急救包,拿起冲锋枪和手榴弹,迎头向敌人开火,很快把敌人截住。第10师第28团在攻击老爷岭战斗中,反复组织多次冲锋,部队伤亡严重,仍能保持坚强战斗意志。

号称能征善战的敌25师,在我军勇猛打击下彻底崩溃,最后甚至出现被我军1个班俘虏几百人的现象,师长李正谊以下8000人全军覆没。《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对国民党逆犯者的“一个沉重的歼灭性打击”。

(作者单位为吉林省洮南市人武部)



▲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萨姆-2”防空导弹

▼群众参观被我军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残骸,我国是世界上击落U-2高空侦察机最多的国家。

创新“近快战法”擒“飞贼”

■戚苏源 高 凯

“近快战法”是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为击落U-2高空侦察机而开创的快速歼敌战法,至今仍是反空袭作战基本战法之一。我军指战员在实战中吸取多次失利教训,在没有先进电子对抗手段的条件下,大胆突破苏军教令的死板规定,创造出压缩雷达开机距离、快速战斗操作等全新战法,屡屡擒获U-2侦察机这一“飞贼”,有效捍卫祖国领空安全。

1963年3月28日,U-2侦察机对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在飞抵甘肃鼎新时,进入我“萨姆-2”地空导弹营伏击范围,指挥员按照苏军教令要求,迅速指挥目标指示雷达开机搜索目标,敌机在目标指示雷达照射时没有任何反应。在敌我距离120公里,指挥员下令制导雷达开机时,敌机却像长了“眼睛”一样立刻转向,在指挥所标图板上留下“∞”形轨迹逃脱。

“3·28”战斗失利后,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号召地空导弹部队人人动脑、创新战法以应对敌新技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后,缩短制导雷达开机距离成为“破敌”最佳方案,初步确定制导雷

达开机距离为敌机距我阵地60公里处,同时须在10秒钟内完成从制导雷达开机到发射导弹的所有动作,这完全超出苏军教令规定。同年6月3日,U-2侦察机对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时,设伏在兰州的地空导弹部队虽然在60公里距离上打开制导雷达,但又一次让U-2留下“S”形轨迹后仓促逃脱。

两次失利使空军各级指战员认识到:U-2高空侦察机已加装先进电子自卫设备,我制导雷达一开机就会被发现。但在当时,指战员们对电子战缺乏了解,对敌人飞机上安装了哪些设备,又是如何工作等情况不甚了解,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技术反制手段,必须打下一架U-2侦察机用以研究。为此,空军确立集团歼敌的思想,在西安地区集群设伏。1963年9月2日,U-2侦察机又一次对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但依然从3个地空导弹营的伏击圈中溜走。3次失利后,我地空导弹部队毫不气馁,进一步统一“近快歼敌”的作战思想,经计算,将制导雷达开机距离定为38公里内。

在明确“近快歼敌”的作战指导思

想后,1963年10月,我4个导弹营集中部署在上饶地区设伏。11月1日,U-2侦察机对西北地区进行侦察返回途经上饶时,被我地空导弹部队运用“近快战法”一举击落。之后,我地空导弹部队利用该战法又先后击落3架U-2高空侦察机,并对该战法进一步完善发展:一是大大压缩制导雷达开机距离,由原来苏军教令规定的120公里压缩到40公里,仅为苏军教令的1/3,大大缩短制导雷达暴露时间,提高打击隐蔽性和突然性;二是将导弹接电、射击诸元计算等原本规定在打开雷达后进行的战斗准备工作,提前到雷达开机前完成,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对敌机快捕快打。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四：

美国军队参谋部

■韩红泽 张 苗

效仿欧洲,起源陆军

美军参谋机构,最早出现在美国陆军中。随着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模式的成功,南北战争后,以埃默里·厄普顿为代表的一些军事家积极要求改革,提出美国军队应建立德国式的参谋部,由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军官组成,主要职责是制定组织方案和作战计划。厄普顿倡导参谋部应为一个实体部门机构,完全由军方领导,不受文官和政府行政干预。

受此思想影响,1899年8月,新任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推动军事改革,对指挥与领导体制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鲁特认为,应彻底取消陆军司令这一“不伦不类”的职位,以陆军参谋长一职取而代之,并成立参谋部,参谋部由参谋长领导筹划工作,制定一切能够应付突发事件的战争计划。这样,就能使多是文官出身的陆军部长得到军队内行的建议。

1902年,鲁特向国会提出组建参谋部的提案。1903年2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参谋部法》,取消陆军司令,设立陆军参谋长一职。8月15日,美国陆军参谋部组建完毕,塞缪尔·扬任美国第一任陆军参谋长,由总统经陆军部长再到参谋长的指挥系统宣告形成。

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参谋长应有高于陆军所有军官的军衔和地位”。1918年5月,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在参谋部设立4个处:作战处、军事情报处、采购贮存与运输处、战争计划处,参谋部的人数也从组建伊始的数十人发展到1072人。

始的数十人发展到1072人。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作为典型的文官治军国家,并没有完全复制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模式。埃默里·厄普顿、伊莱休·鲁特等一大批军人曾数次想参照德国模式,组建总参谋部以指挥和控制全国军队,但在历次参谋部与陆军部的权力角逐中,文官为主的陆军部往往能够获得总统和国会的支持,因此尽管陆军参谋长和参谋部地位得以提升,但依然无法越过陆军部指挥全军。

二战中组建参谋长联席会议

美军实行国防内设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制度,其首长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设主席办公室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组成。参联会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的最高军事参谋机关,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通过其实施作战指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创建于1942年。之前,美军并没有领导、指挥三军作战的军事统帅机关,仅有一个属于联络性质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03年由伊莱休·鲁特提议组建,由于未被法律赋予强制执行决定的权力,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始终未有大的作为。

二战时期,美国宣布参战后,为方便与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协作,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下令组建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武装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当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正



二战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参加工作午餐会

式成立,下设12个委员会和战略情报局。在罗斯福领导下,这个既没有经过法律批准也没有经总统正式定义的新军事机构成为美国对陆、海军进行协调和指挥的主要机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协同工作,计划并实施广泛的战略指挥,对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战后历经多次改革

1947年,美国通过其国防结构的基础性法案——《国家安全法》,负责对三军实施指导、管理与控制的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该法律同时规定撤销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在国防内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总统和国防部的顾问机构。在1949年8月的修正案中,国防部权力进一步加强,美3个军种降格为国防部下属单位,同时为限制军种间竞争,国会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设主席一职,该职务为美国武装部队中级别最高的军官。

虽然设立主席一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的同时并没有

得到明确界定,从成立最初能够对美武装部队实施统一指挥的核心部门变为国防部顾问机构,许多权力和职能被模糊。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指令洛克菲勒委员会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用进行调查,发现它职责不清,对军队指挥当局提供咨询的作用不力,然而调查报告并未引起当局足够重视。1958年,美国对国防部机构进行改革,通过《国防部改组法》,明确提出应加强参联会和主席的权力,规定参联会主席拥有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的表决权。

1986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规定参联会主席是总统及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可就重大问题直接向总统汇报。参联会主席获得原参谋长联席会议集体职责,可向武装部队提供战略指导,制定战略计划、训练条令,作战及联合演习计划,评估国防预算和国防采购计划,审阅人事报告和军官晋升等。至此,参联会的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延续至今。

尽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在美国文官治



军的背景及全权国防部的体制下,随着《国家安全法》决定设立统一的国防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地位上升的空间法定有限,其将始终被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下属机构并受国防部直接领导。之后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更是明确规定美国实行“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从国防部长到作战司令”的指挥体系,并指出参联会没有指挥作战部队的行政权力,这宣告美军大权由国防部掌管的同时,又进一步弱化参联会在军内外的地位。总的来说,与其他大国参谋机构地位和作用相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相对是一个弱勢机构。

“闭关锁国”遗害无穷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民用船只有着严苛的限制。康熙年间,清廷下令渔船只能是单桅船,商船只允许采用双桅,对民用船只的吨位、长度,甚至是每船的人数都做了限制。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对民用船只的限令总体上趋向收紧,不仅进一步对船只大小和出海人数进行限制,甚至船上用来压舱的石头也被视为武器禁止携带。清朝对民用船只的限制严重破坏了沿海的渔业和商业发展,对于中国船舶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日幕府造船“厄介”

日本幕府统治末期,为发展海军采取了自建和外购军舰两种方式。1854年1月,幕府命令中滨万次郎翻译相关外文书籍,划出专门的造船用地,委托水户藩负责建造。当月,洋式木帆船“旭日”号动工。但由于设计上的错误,“旭日”号航行非常困难,被当时的人戏称为“厄介”号,“厄介”在日语中有麻烦、难题之意。

“旭日”号设计建造的重要参与者中滨万次郎,又被称为“约翰万次郎”。中滨万次郎15岁时所工作的渔船遇风暴沉没,他与其他4名渔夫在无人岛上生活143天后,被美国捕鲸船“约翰·霍伊特菲尔德”号救起并随其远航,并在其船长的帮助下在美国读书。中滨万次郎回到日本后,利用所长,大大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乌 沃)

